

✧ 最新简明英语系列教程 ✧

# 最新简明英语翻译教程

本册主编 冯伟年

丛书编委 按姓氏笔划排列 雪

王 凯 王 萍 王晓勇

冯伟年 甘雪雁 田建国

石永珍 刘奎卫 刘美岩

曲文婕 池 英 吴 琨

李颖玉 辛 柯 陈冬梅

陈 德 彼尔·福乐 范林红

赵 硕 赵堪培 梁德智

童俊虹 褚 辉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西安 北京 广州 上海

最新简明英语系列教程(最新简明英语翻译教程) 冯伟年著. 原西安: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1999

Ⅰ. 冯... Ⅱ. 冯... Ⅲ. 英语 原翻译 原教材

Ⅳ. 英语 原翻译 原教材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2345 号

## 最新简明英语系列教程 最新简明英语翻译教程

本册主编 冯伟年  
责任编辑 马可为  
封面设计 高宏超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地 址 西安市南大街 123 号 邮编 710000  
电 话 (029) 8888888 (总发行部)  
(029) 8888888 (总编室)  
传 真 (029) 8888888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2  
字 数 300千字  
印 数 10000册

版 次 1999年 12月 第 1版 第 1次印刷  
书 号 957·001·12345·001  
定 价 12.00元

# 前 言

我们在研究分析二十余年来我国翻译界关于翻译教学的研究成果和翻译教学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编写了这本书。本书的最大特点是理论紧密联系实际，内容新颖，题材广泛，实用性强，操作性强，把目前翻译界公认的、行之有效的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通过大量实例的评析，深入浅出地介绍给读者。本书可作为高校英语专业英译汉教材，也可供英语自学者学习英汉翻译时使用。

高等院校翻译课的教学目的是通过各种文体的翻译实践，运用翻译基础理论，训练学生在词义、词序、语法形式、修辞手法、文化背景等方面对比英汉两种语言，掌握翻译的基本技巧，从而培养他们独立从事英译汉、汉译英的能力。对英译汉，要求翻译相当于英美报刊上中等难度的文章。题材包括日常生活记叙，一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论述，科普材料和浅近的文学原著。速度为每小时 100 个英文单词。译文忠实于原文，语言通顺流畅。

目前我国翻译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高等院校本科阶段的翻译课主要还是一门实践课，应以实践为主，理论应该为实践服务，而不宜过多地追求理论本身的系统性。本书力求融理论与实践于一体，每一章介绍一种翻译技巧，然后对一篇短文进行翻译评析，所选短文题材力求做到多样化。在评析每篇短文的翻译过程中，将涉及到的翻译理论、翻译技巧和翻译方法贯穿其间，让学生反复体会某一翻译技巧在不同场合的不同处理方式。在翻译实例评析中，我们对同一原文的不同译文进行评论，目的是让学生在分析误译中学习正确的翻译方法。将一些有争议的译作拿出来讲评，让学生在评析不同风格的译作中学习翻译技巧，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此外，学生也可从中学会如何正确地开展翻译批评，繁荣我国的翻译事业。

短文翻译练习由易到难，题材涉及面广，其参考译文附于书后。由于编者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欢迎专家和读者们批评指正。

编 者

二〇〇九年 月 于

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 第一章 翻译的性质、标准和翻译工作者所应具备的必要条件

### 第一节 什么是翻译

什么是翻译？

这是翻译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历年来，中外翻译理论家对此作出了无数回答。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

中国翻译家所下的定义：

● 翻译是将一种文字之真义全部移至另一种文字而绝不失其风格和神韵。（吴献书，*吴译*）

● 翻译是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张培基等，*吴译*）

● 翻译的实质是语际的意义转换。（刘宓庆，*吴译*）

● 翻译的定义应该是：“将一种语言传达的信息用另外一种语言传达出来。”（蔡毅，*吴译*）

● 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文字所蕴含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文化活动。（王克非，*吴译*）

● 翻译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沈苏儒，*吴译*）

外国翻译家所下的定义：

● 好的翻译应该是把原作的长处完全地移注到另一种语言，以使译入语所属国家的本地人能明白地领悟、强烈地感受，如同使用原作语言的人所领悟、所感受的一样。（泰特勒，*吴译*）



● 翻译就是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在内容与形式不可分割的统一中所业已表达出来的东西准确而完全地表达出来。(费道罗夫, 1982)

● 翻译的定义也许可以这样说:把一种语言(来源)中的篇章材料用另一种语言(目标)中的篇章材料来加以代替。(卡特福德, 1982)

● 翻译就是在译入语中再现与原语的信息最切近的自然对等物,首先是就意义而言,其次是就文体而言。(奈达, 1980)

●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在保持内容方面(也就是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外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的过程。(巴尔胡达罗夫, 1982中文版)

● 通常(虽然不能说总是如此),翻译就是把一个文本的意义按原作者所意想的方式移译入另一种文字(语言)。(纽马克, 1981)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谈到翻译的本质问题时离不开原语和译入语,原作者和读者,原作和译作,原语言文化和译入语的文化。各国的翻译家们都注意到了这些因素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而且其看法是相当一致的。差别或者说是分歧之处仅仅在于如何界定翻译这个具体的过程和怎样提出翻译的要求与标准。从以上这些所引用的定义来看,把翻译比喻成语言和文化交流的桥梁是十分恰当的。

## 第二节 翻译的性质

翻译到底是科学还是艺术?在翻译界,这已经是个久悬未决的问题了。关于这一点,译界的许多老前辈也都从不同角度做过深刻地探讨和研究。

陈生保在他的《英汉翻译津指》一书中明确提出



“翻译是一种艺术，而非科学”，并在后文中予以说明论证：①艺术表现个性，因人而异；科学表现共性，不容变动。②艺术创作千差万别，不同的人对同一题材、同一内容的表现方法可以有所不同；而科学研究则需按照一定的规律，遵循一定的方法，不同的人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同。③艺术创作表现作者的气质和风格；科学发明则反映客观存在。④科学上的成果可以通过学习和推广为全人类所共有；而艺术创作则难于模仿，永远属于个人所有，永远带有个人的独特风格。所以说翻译是艺术而非科学就是因为翻译不能像科学一样制定出确定的公式和规则，而是创造性地运用技巧。因此，同样的原文，同样地遵循翻译标准，不同译者的译文却会有很大差异。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家奈达博士曾一度认为：翻译不仅是一种艺术，一种技巧，还是一门科学。所谓科学，是指可以采用处理语言结构的科学途径、语义分析的途径和信息论来处理翻译问题，也就是采取语言学的、描写的方法来解释翻译过程。但是后来奈达却放弃了这个观点。谭载喜教授在他编著的《新编奈达论翻译》一书中为此专门作注指出“编译者认为，‘翻译是科学’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翻译不是科学，翻译学才是科学。”其实早在1949年代末，谭载喜教授就曾撰文详细讨论过这个问题。在其《试论翻译学》一文中，他不仅区分了“翻译”和“翻译学”这两个重要的概念，还明确了翻译学的性质，并初步探讨了翻译学的基本框架。1955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黄振定的《翻译学——艺术论与科学论的统一》，1956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又出版了彭卓吾的《翻译学——一门新兴科学的建立》。他们都对翻译学科的建设作出了积极的探索。其中彭卓吾先生根据《辞



海》和恩格斯、毛泽东等人为科学所下的定义对翻译学加以考察,从而肯定地认为“翻译学本来就应该是一门科学”。

以上译界前辈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固然令人振奋,可是为什么至今还没有出现系统的翻译学呢?这首先是由于翻译活动本身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其次是翻译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场合,人们对其要求也有所不同,因此要从理论上对其加以界定并非易事。彭卓吾先生就在自己的著作结尾给广大读者提出了期望,并明确指出“中外广大译论界人士一致认为,建立科学的翻译理论体系和翻译学是一项极其艰巨而浩大的工程,这样的工程只有集众人之智,汇众人之力,群策群力,通力合作,才能完成。”谭载喜教授在提到这个问题时还曾指出,直到1980年,西方国家在译论研究和翻译学建立方面也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

### 第三节 翻译的标准

#### 一 翻译标准的作用及研究意义

究竟怎样的译文才算是“准确”呢?这也是个长期以来困扰广大翻译工作者和翻译理论研究者的大问题。其实说穿了,这就是“翻译标准”的问题。

翻译标准是翻译理论研究中最为重要也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它关系到翻译理论研究、翻译实践和翻译事业的进步发展和兴旺繁荣。因此,我们应该而且必须认识到研究翻译标准的迫切性和艰巨性。

目前各国译界对翻译标准的认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中国,自从严复提出“信、达、雅”三字标准后,中国的翻译工作者对翻译标准的研究和探讨就从未停





止过。那么,翻译标准究竟有什么作用呢?它的存在有必要吗?其重要性又在哪里呢?

庄夫认为翻译标准的主要作用可以概括为:“镜子、监督、依据、促进、良药、基础”这十二个字。“镜子”是说翻译标准可以反映人们对翻译的本质和翻译工作本身的认识,而对翻译标准的研究也正可以反映翻译理论的研究水平。“监督”是说如果译者和译作出版部门有了翻译标准意识并且能够而且愿意认真执行翻译标准,那么这个翻译标准就可以成为制约翻译工作、衡量译作优劣的准则。“依据”是指翻译标准可以成为评论译作的依据,推出优秀译作,使翻译事业健康发展。“促进”是指翻译标准给大家指出了努力方向,提出了奋斗目标。完善的翻译标准可以加速培养优秀的翻译接班人。“良药”是说翻译标准的存在有助于预防和治疗诸如“死译”、“滥译”之类的译作疾病,有助于消灭翻译垃圾。“基础”即翻译标准是进行翻译理论研究的根本基础。

在中国翻译史上,可以说对于翻译标准问题的激烈讨论一直伴随着翻译事业的发展。其实这也恰恰从另一方面证明了翻译标准的重要性之所在。尤其是我国近代翻译史上关于翻译标准的论战更是值得我们深思。

六 关于翻译标准的争鸣——我国翻译标准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说到翻译标准,就不得不提起我们早已熟知的“信、达、雅”之说。这是中国近代著名翻译家、翻译理论家严复在他的《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的。其中,“信”是强调译文必须忠实于原文,“达”是强调译文应该通顺易懂,“雅”在严复时代指的是桐城派风格,现在一般赋予“雅”新的涵义,即要求译文有文采。严氏



标准近百年来在中国译坛上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对我国翻译工作者产生过而且仍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它得到了相当一部分翻译实践家的肯定和发展，但同时也遭到了很多批评和指责。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译界关于翻译标准问题曾展开过一场激烈的争论，许多翻译家和文学家都提出了自己对翻译标准的看法和主张，此后可以说，在中国翻译界和翻译理论界中关于翻译标准的讨论和争鸣就从未停止过。其中最为著名的有林语堂的“忠实、通顺、美”，鲁迅的“宁信不顺”，瞿秋白的“信顺统一”，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等等，此外还有“信、达、切”；“达意、传神、文采”；“准确、通顺、易懂”；“忠实于原作，译文明白晓畅”；“准确、流畅”；“信、顺”等诸多说法，但实际上，除了严复的“雅”字争议较大以外，以上的种种主张和见解基本上是对严氏三原则的进一步解释、深化和引申，不过其侧重点各有不同而已，对于“信”和“达”多数人是持肯定态度的。其实这也正说明“信”、“达”两点是翻译的基本要求。对于初学翻译的人来说，只要能做到“信、达”，即“准确和通顺”也就不错了。

作为原文的译文，当然首先应该“信”，把原文的意思准确地表达出来，不能掺杂任何个人的见解和主张。即使迫不得已翻译一些文章，而你又非常反对原文的观点，也只能靠加注或另写文章批判的办法来解决，要么就只好放弃翻译了。一旦加上了自己的感情色彩，甚至有的译文与原意相悖就不能算作合格的翻译，也许连翻译都不是，最多只是拙劣的“创作”而已，那样的所谓“译文”只能坑害读者。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百分之百的绝对忠实往往是达不到的。因为译文除了主要受

原文约束之外,语境因素、文化因素、读者因素等都会对译文的表达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其次是“达”,即按照译入语的语法和表达习惯将译文组织成通顺易懂的文章。这一点也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一篇译文语无伦次,无人能懂,要它何用?

此外,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达”和“信”的关系。其实译文是否通顺往往和对原文的忠实程度息息相关。译文不通,也就无法领略原文的意思;反之,一篇错漏百出的译文也不大可能行文流畅。关于这一点曾有人认为,既然二者的联系如此紧密,不如只提一个“信”字足矣。

至于“雅”则属于高层次的追求,它牵扯到风格、文体、修辞等诸多问题,这里暂且不论。

#### 六、国外的翻译标准研究

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外国的翻译理论也随之被引入中国。大家所熟悉的“泰特勒三原则”便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外国译论之一。到了20世纪50年代,俄语成为我国的“第一外语”,前苏联的一些译学理论也就被大量介绍进来,费道罗夫的“等值论”就曾对我国译界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后来由于国内学者金隄、许景渊、谭载喜等人的介绍,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博士的“动态对等”和“功能对等”理论逐渐为中国译界所熟悉。此外还有英国纽马克的“文本中心”论等。这些理论对翻译标准都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参见第二章第二节的“西方翻译理论史”部分。)

#### 四、翻译标准的具体化问题

翻译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并不是一种纯语言或纯文化问题,它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用,即必须达到交流信息的目的。而随着目的的不同,我们应该对翻译提出不同的要求,即翻译标准应该具体化。只有制定出一





个能为广大翻译工作者和理论研究者普遍认可的具体的翻译标准,才能摆脱目前这种纯粹的理论之争,真正地将翻译标准用于实践;只有具体的翻译标准才能对翻译实践活动起到切实的指导作用;也只有借助具体的翻译标准才能使翻译批评更具有说服力。

当然,对于所谓“具体化”,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可以有不同的划分方法。例如我们可以以时间、作者风格、文体、目的为划分依据。但多数人主张按照不同的文体和目的来确定不同的翻译标准。比如议论文和说明文(包括科技文章)应该特别强调“信”和“达”,记叙文和小说等应格外注意“雅”。

#### 第四节 翻译工作者应具备的必要条件

我国著名作家、翻译家茅盾先生曾于 1957 年 8 月在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做了题为《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的报告。其中就此问题,他强调指出:“精通本国语文和被翻译的语文,是从事翻译工作的起码条件。文学作品的翻译者,则除了精通语文而外,还需具备一般的文学修养。而要做到艺术创造性的翻译,则除了上述种种而外,还必须具有广博丰富的生活经验,以及对于被翻译的作者及其作品之全面的研究和深刻的理解。”达尼卡·赛莱斯科维奇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也曾说过:“……语言只是理解意义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若想正确理解意义,译者不仅要拥有语言知识,还应有足够的主题知识、百科知识。总之,需要有广泛的语言外的知识。”

其实,除了拥有这些语言及语言外的丰富知识,翻



译工作者还需要有很强的理解和领悟能力、良好的鉴赏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外文作品都适合中国国情，也不是所有的作品都很好理解、都值得翻译。此外完美的人格对他所从事的翻译事业也会起一定的辅助和促进作用。





## 第二章 中西翻译理论的历史和现状

人类的任何进步都有赖于借鉴前人的经验，翻译自然也不例外。所以在系统地学习翻译理论和实践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古今中外的翻译史和翻译理论研究状况加以了解。

### 第一节 中国翻译简史

关于中国翻译史的阶段划分，目前尚无定论。这里介绍两种划分方法，供大家参考。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近两年出版了一套《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在其总序中，编者明确提出“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五四’时期的西学翻译。”序言中还认为“中国历史上第四次翻译高潮正在神州大地蓬勃推进，方兴未艾，景况壮观。”回顾中国现代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的飞速发展，学习外语的中国人越来越多，甚至一度出现了“外语热”，中国的翻译事业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涌现出不少优秀的翻译家。信息时代和市场经济的特点已经注定了这一时期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研究活动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前三次高潮无法比拟的。

在陈福康编著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中则是按照中国历史的分期来划分的，即把中国翻译史划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四个部分。古代翻译史起于先秦时





有关翻译的零星论述，至清朝乾隆初年《番清说》为止。这一时期主要包括前两次翻译高潮，即东汉至宋代的佛经翻译和明清的宗教、科技翻译。近代翻译史起于鸦片战争止于“五四”运动。其主要内容包括洋务派和维新派人士的理论。现代翻译史从“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主要研究鲁迅、瞿秋白、林语堂等人的译论及其译作。当代翻译史则从建国后至今。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翻译理论著作和译作不仅来自老一辈的翻译家和文学家，还有包括海外华侨和港、澳、台三地的广大翻译工作者。

按照陈福康的分析，以上两种对翻译史的叙述方法都属于“按照历史发展顺序，挑选一些重要的译论者，分别作介绍和评述”。其实还有一种方法是不论时间先后，只按流派、类型等标准来划分，并对不同的流派和类型予以分析和综述。他还仔细区分了这两种写法的优缺点，认为第一种写法容易“只见树不见林”，第二种写法容易“只见林不见树”，而他本人之所以采取前一种写法除了“喜欢”之外，还考虑到我国翻译史研究刚起步，资料搜集不够完整，而且这种写法的优点是时间概念清晰，能够提供较为丰富的资料，重要部分还可以得到详细论述。下面我们就按照时间的顺序，重点去看一看这些“树”。

中国古代佛经翻译又可分为三个阶段，从东汉末年到西晋为第一阶段。那时候的翻译力量主要是外籍僧人和华籍胡裔僧人。由于政府对翻译尚不支持，佛经的翻译主要靠民间信徒的资助来完成，所以经费十分有限，译作也少有长篇巨著。从翻译方法上来看，由于僧人们过于虔诚又没有经验，所以主要靠直译，甚至是“死译”、“硬译”，加上那时候译经都采取口授形式，因此可信度不高。第二阶段从苻秦译场和姚秦译





场开始,大批翻译人才开始从事译经活动。翻译由私译转入官译。到了隋朝,上林园里设置了翻经馆,这个常设机构取代了先前的临时性译场。在这一阶段翻译理论和技巧也有所进步。支谦突破了以往的直译法,开始追求文字的典雅;道安总结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规律;彦琮在其论著《辩正论》中提出了翻译要例“十条”和对译者的要求“八备”;鸠摩罗什开始提倡意译;慧远等人则对译文的风格和文体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佛经翻译的第三阶段在唐朝。此时的主要译者多为本国人,他们除了精通佛理以外还精通梵汉两种语言,其译作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前两个阶段。加上唐朝统治者的重视和支持,这一阶段的译经活动达到顶峰,出现了玄奘、不空、义净等著名的僧人译经家。其中玄奘提出了佛经翻译中著名的“五不翻”的原则,并为译经者进行了十一种详细的分工。

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前,著名的禁烟英雄林则徐决心“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开始“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被誉为“组织翻译活动的先驱”。这之后便出现了洋务运动。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洋务派在输入外国工业,制造船炮的同时注意改革教育,培养外语翻译人才,引入了不少国外的科学书籍。当时最著名的翻译机构是京师的同文馆和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而以后者译文质量高出一筹。这时候著名的译员主要有徐寿、华衡芳、李善兰、贾步纬、李凤苞等。值得一提的是语言学家马建忠在其《拟设翻译书院议》一文中留下了一些有关翻译的论述。他提出有三类书籍急需翻译,并指出“需要择其善者译之”。此外,他在总结了当时译文中常见的不足之后提出了所谓“善译”的翻译标准,要求译文与原文之间“无毫发出入于其间”。甲午战争后,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政治舞台,他们

